

和運史話

新中國報社出版

新中國叢書

第一種

和運史話

新中國出版編輯印

民國卅二年七月十六日

翻譯者·崔玲等

出版者·新中國報社

上海河南路三〇八號
電話一五一四三

總發行·街燈書報社

經售處·南京建國書店
蘇州新國民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售

定價·每冊五元

出版期·卅一年一月十六日
民國卅二年七月再版

編序

目前，和平運動雖正在向康莊大道上邁進，但它原是從苦難荆棘中生長起來的。在這過程之中，有許多可歌可泣彌足珍貴的祕密史實，爲目前一般報章所不及記，將來官方史籍所不及傳，而確成爲使和平運動從苦難荆棘到康莊大道之重要因素者，特經本社多方搜集，編譯成輯。

「汪先生河內脫險記」，爲親身忠誠協助汪先生自河內脫險之東京日日新聞社特派記者森本泰真夫所撰，原載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四日至七日之該報。

「汪先生苦難回憶錄」，「林柏生先生香港遇險記」及「和平運動的長成」等三篇，自成一系統，爲中日間交涉之珍貴而祕密之史料。由東京朝日新聞特派記者記述，原載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七日至九日之該報。「中日交涉祕史的插曲」，則原載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四日上海每日新聞。

周佛海先生於一九四〇年冬在東京時，曾向日日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臚述和平運動之前後經過，其中頗多爲世人所不及知者，惜由該報發表時，與原談話記錄者有所出入，故本書中暫不輯入，這是非常遺憾的。待將來經周先生親自修正後，當於再版時補入。

汪精衛先生的「舉一個例」，周佛海先生的「回顧與前瞻」，李聖五先生的「揮淚辭商務」，均爲和平運動過程中之珍貴史料，特一併輯入本書，俾成完璧。

和運史話 實價五元

詳述和運經過之祕密史實，爲報章刊物所未見者，都五萬言。

歐洲七大秘密 實價八元

法國名作家洛曼斯作。揭發國際政治內幕，祕密外交活動，此次世界大戰之導源。

上海衆生相 實價七元

集上海黑暗面之大成，描寫男男女女形形色色之各種陰暗而活動。

中國內幕

大膽揭破我國政治上的種種祕聞，以及軍政人物的珍聞軼事，莫不搜羅俱備。

- 一集 實價八元
- 二集 實價十元
- 三集 實價十二元
- 四集 實價十元

歐戰現地報告 實價十二元

此次世界大戰發生後之國際人物描寫，歐洲戰地現象及戰術納評述，爲最珍貴之現代史料。

大東亞戰爭的勝利 實價十二元

日英美太平洋戰爭實錄，南洋地方風土人情之描述，是一部新鮮生動之報告文學。

勝利的記錄 實價十元

最近日英美在太平洋上之大戰，以及在緬甸，南洋各島上之戰況，陸海空潛艇諸戰役，大都是目擊的記載，驚心動魄。

時局人物 實價十元

此次世界大戰中，參預之風雲人物，或則爲政治領袖，或則爲一代名將，或則爲財閥，在幕後操縱，或則在外交上活動。此書不獨可作名人傳記讀，亦可藉之了解國際政治狀態及當前戰爭之內幕實況。

和運史話 目錄

汪先生河內脫險記·····	(一)
汪先生苦難回憶錄·····	(一七)
林柏生先生香港遇險記·····	(二一)
和平運動的長成·····	(二五)
中日交涉祕史的插曲·····	(三一)
汪精衛先生：舉一個例·····	(三三)
周佛海先生：回憶與前瞻·····	(三九)
李聖五先生：揮淚辭「商務」·····	(五七)

汪先生河內脫險記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打開法文的早報，在中國記事欄極小的一角，突然發現路透社重慶的電訊：「汪精衛逃出重慶，避往河內。」當時我好像受到了電的打擊，如果這是事實，對於新聞記者的確是一件大事。

我立即向各方面連絡——當時在河內活動的K氏，木村氏，及河內帝國領事館等都急速地連絡着。不久本社（東京日日新聞社）的香港支局來了電報，河內的英文中國郵報（China Mail）和大公報也有同樣的記載，各方面都以爲這事情好像是確實的。

在這裏，我用一句話來說明，安南的報道機關是不完備和沒有能力的。假如不明瞭這一點，對於以後所記的事實，恐是不會被諒解的。安南的所謂新聞，用法語，安南語，中國語（祇有西貢一個地方）發行的三種報紙，每天祇不過發行一千份上下，是極其渺小的。從新聞的內容看起來，也是極其貧弱的。用自己獨有的方法收集材料簡直是沒有一家做得到。大部份是用法國哈瓦斯通信社的支社亞立甫通訊社所提供的，在外國通訊社用英語廣播所記錄下來的同盟，中央，路透，AB等的消息，都按日逐條排在白紙上。其他的新聞也僅僅是地方通訊，和官廳的佈告而已。至於各種論文，不過是補白的東西，在我的「新聞」觀念看來，簡直是不成樣子的。一句話，安南的報紙，祇是「法國僑民會報」的程度。安南語的報紙，更是追隨法語報紙之後，所謂編輯，祇不過是如同飲茶一樣隨便罷了。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我們想從安南的報紙來得到關於汪氏行動的情報，簡直是絕對不可能的。我以爲，要得到特別的消息，祇有向安南當局使用探詢的手段，和向中國人方面實行偵察的兩個方法。

在安南方面，我因爲是「新聞記者的關係」，多少還有點連絡，但他們對於這件事並不曉得；我又想到汪氏從重慶飛來，便訪問歐亞航空公司，也得不到答覆，看乘客的登記簿也找不着；我想，也許他是用假名的，訪問亞立甫通訊社也沒有結果；再訪問各新聞社，也歸於徒勞；全部新聞記者的手段用盡了，還不能知道這事實的眞假。

最後的手段，祇好使用間諜了。不過，因爲我從來沒有這個必要，所以並沒有帶着一個間諜來。要一朝一夕間得到一個間諜是不可能的，也不能把他培養出來。在這樣的急需時候，真是沒有辦法。

實在的，我已經走向日暮窮途了，對於本社重大的使命，儘可能早點盡打電的使命；但現地的新聞，手頭上一點也沒有。

在深刻焦躁的夜裏，我到海防去訪問總領事館的橋丸書記生。我拿了這樣的情報回來：「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氏，爲着交涉關於運送軍火的問題，前日到河內來。」

廣東陷落後，由於我方（日方）要求的結果，從安南運送援蔣的物資正在減少的時候，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張公權氏，爲着與安南當局折衝交涉，曾經來越，可是，事實上並沒有成功；而這一次外交部長王寵惠的親自出馬，所以成爲汪氏逃走的誤傳也說不定的——我們大家都下着這樣的判斷。

不過，從香港支局來的電報，却強硬地指出：「除王寵惠到安南以外，汪氏的出走，是絕對沒有錯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晚，在下村日本僑民會長招待日本有名的僑民席上，同盟社特派員大屋久壽雄氏向橋丸書記生提出關於汪氏問題的質問，究竟海防所得到的情報是不是眞確的，從下面的事實上便可以判斷。即橋丸氏曾詢問一個和他有關係的中國人，Wang Chung-Hui的來，「是不是外交部長的王？」他

答覆：「是的。」後來大屋君對橋丸氏又不客氣的指摘：「這一個中國人的知識程度是不是很高的，對於利用中國人作特殊任務的時候，不要給他什麼暗示，應該用誘導的質問才可以的。中國人常常要使我们疏遠着中國的現狀；還有，假如他要達到得着報酬的目的時候，他的回答是會迎合我們的心理也未可知的。」

這樣的結果，我們想，也許這一個中國人並沒有曉得是汪精衛，所以把容易誤會的 Yang-Chung-Hui (王寵惠) 與 Wang-Ching-Wei (汪精衛) 的發音弄錯了也未可知。

汪氏真的到河內來了嗎？要是來了，藏到什麼地方去呢？在茫無頭緒的情形下，又過去幾天了。正當這一個時候，在某處作事很久的一個安南老人，我便託他向總督府內，他的有力的朋友那裏去調查真相。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上，他的第一個報告：

「汪氏的確伴同他的夫人到河內來了，在巴尼愛（譯音）街二號，由中國某珠寶商人的盡力下，祕密他的身份，現在入了市內某醫院。」

於是立即不擇手段地和那一個廣東的珠寶商接近；同時對汪氏可能進入的特納山醫院和聖保羅療養院調查這一真實的事實。在這個時候，我痛感到情報網確立的必要了，於是用五個安南人和一個法國人來做間諜。調查了這兩個醫院以後，又歸於徒勞。十二月三十日又得到「汪氏在河內郊外八十七基羅的達姆泰阿」和「在海防郊外二十二基羅多宋」的二個情報。

於是，即夜，由木村氏駛汽車到海防，而我又偕着兩個助手到多宋去。苦心地向旅館和其他地方調查的結果都落空了，這樣子確實的證據，一點也得不到。

不過，在香港，汪氏的機關報，已經破天荒地發表和平的建議了。汪氏的活躍，已在我們的眼前，

但是，他住在什麼地方，却無法知道。祇好抱着極度的焦躁和憂鬱來迎接新年了。

一月二日晚，在某處的坂本君突然來了一個情報：「汪氏的確住在達姆·泰阿的多迦斯加。泰爾喬旅館中。」同時我們的情報網也得到達姆·泰阿的旅館，從他在河內的總店「美突羅堂」旅館寄出了六個人的鋪蓋，食料品和其他的物件的報告。

這一個達姆泰阿是在河內西北八十七基羅的「東京達爾特」裏面，那是一座標高千四百米突的石灰山。在二千米突附近，有一所避暑的住宅。河內的「美突羅堂」旅館便在這一地方設立多迦斯加。泰爾喬旅館，本來是預備在酷暑的時候吸收避暑的旅客的。從冬季十二月起，至三月底便封鎖了，在封鎖期間，祇不過留着幾個僕歐，並沒有接客的準備的，這一次也祇有汪的一派才能到這個地方來。

十多天以來，每日奔跑，苦心慘淡地，在我們間人一致的協力下，訪尋汪氏的住所總算是成功了。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即，以新聞記者的資格，關於汪的問題，怎樣去處理呢？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我收到在香港新聞紙上發表的汪氏的和平建議。我和K，橋本兩君便開始理論上的鬥爭，拿汪氏和平建議的文章來檢討他的真義，我們認為他的離開重慶，並不單單是逃避，這問題一定是很複雜的。在中國及外國通訊社會有這樣的意味深長的報道：

(一) 汪氏因病赴河內療養。

(二) 帶着蔣氏的密令，訪問外國，為中國抗戰而活躍。

(三) 蔣氏禁止中國報紙非難汪氏及其同志。

我們對這些報道的真假，在我們的判斷中並沒有受到欺騙。我們議論的中心，是下面幾點：

(一) 近衛聲明和汪氏聲明，中間有怎樣的關係呢？

(二)是不是和蔣氏發生意見而離開重慶呢？

(三)表面上是逃走，裏面是不是得到蔣的諒解而另有關係呢？

(四)今後的行動怎樣呢？

在事變前，和中國方面有特別關係的木村氏，他的意見以爲：「以汪氏廉潔的人格判斷，今天，他的行動是不會含有陰謀的要索的。正如汪氏的和平建議中所說：因爲公然主張和平的意見，便和蔣氏的意見起了明確的對立；結果，祇好用逃走來貫徹他的主張。」對於這一點，K氏却認爲：「汪蔣之間，或者是有暗中的諒解的：因爲蔣氏以抗戰建國的立場，在情勢上，公然倡導和平是不可能的；也許抓着和平的機會，便使汪氏出來活動，也未嘗不可。」

我們對於這兩個人的意見，都認爲是有事實上的根據的。對於汪氏主張和平的真義，這個問題，是有慎重中而又慎重處理的必要。特別是，在遺中間，日方與汪氏究竟取得怎樣的諒解，我們都認爲他是爲着疏通而來，是沒有疑義的。

我是個新聞記者，我十分知道，我負有全面報道的使命；以新聞記者的立場，是不能不排除一切的困難，以汪氏爲新聞的題材的。不過，報道是不能不以國家全體的見地來作判斷；現在已經不是脫離國家的見地，爲報道而報道的時代。從本社來的密電，指令我：『查明汪氏隱居的住所，排除一切困難，收集此項材料。』可是，我對於我自己的信念是不能移動的，我們認爲近衛聲明和汪氏聲明之間，是沒有什麼關聯的。這樣輕率地，以我這一個日本的新聞記者，去訪問他隱匿的住所，我担心着，對於他的立場，是不是會有些不利呢？還有，訪問的結果，使他隱匿的住所，暴露於中國人與安南人之前，也是有問題的。我有點迷惑了。在迷惑中，我自己並沒有停止我的工作；我裝做觀察大劍鑛山的模樣，駛汽車

經過達姆泰阿到更遠的方向去。不過，我並不以從山麓間遙望達姆泰阿爲滿足，我同時用種種的方法和手段，不斷地努力探明這一個真相。

一月九日晚上，我得到汪氏於是日下午五時從達姆泰阿下山，到美突羅堂旅館去的情報。這個事實，在我們的想像中，他是不會離開河內到別的地方去的。K氏也作同樣的意見，究竟怎樣去訪問他呢？我們以爲最好先寫封信去，在K氏和木村氏的協力之下，我們很快地寫了一封日文信，和一封信文信。十日夜九時半的樣子，我們便帶着信到美突羅堂旅館訪問去了。把信送去以後，便鎮靜地等待着。會仲鳴在我們的面前出現了。和曾氏最初的會見是在美突羅的沙龍裏。這個時候，知道汪氏不會離開安南，我們便安心下來了。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我乘汽車到達姆泰阿去了。在旅館裏祇有幾個僕歐正在擦地板，幾個電燈工人在做着工作。我正擔心着不能走進去，而想跑回來的時候，幾個僕歐却沒有禮貌地把我領進去。我僅僅給了他們一些酒錢，他們便喋喋地說：汪氏住在三百三十四號，他的女兒也在那裏。

在廊下等了很久，我是打算今天無論如何要會到他的。會仲鳴氏在走廊的電話室裏，不曉得和那裏通話，大概有三十分鐘之久，由電話裏送出一個一個的阿拉伯字的電報號碼。

我和曾氏第二次會面的時候，曾受K氏的委託，說明他自己曾到美突羅堂去找他，好幾次都碰不到，他是希望和曾氏會面的。然後，又問了幾個問題，約略談了半個鐘頭，我便下山了。

一月十九日，香港南華日報的林柏生氏被刺了。十九日晚，汪氏等又第三次由達姆泰阿下山到美突羅堂去了。二十八日，在可浪（譯音）街二十七號買了一座新建的房子，汪氏移到那邊去了。裝設了兩個電話，預備二架汽車，大體上好像要準備在那裏久居的樣子。在這期間到處宣傳着，許世英和王寵惠受

了蔣的命令來與汪氏談判；又有汪氏到香港，到上海去的謠言。我漸漸和曾仲鳴接近了，也得到他的相當信任的樣子，隨時在必要的時候都可以會面；不過，他是守口如瓶的，一點真相也發現不出來。曾氏和K氏的會面，因為還沒有到這樣的時機，中間便斷絕了。這個時候，汪氏的立場已經有幾分知道了。對於汪氏的問題，是不是可以由新聞記者來任意發表呢？但每次依然在不發表的方針下。

一月二十八日，從香港總領事館來視察的黃田領事來了，從這情況看來，他是會和汪氏會面的。K氏和高崇武氏在二月六日從河內一同乘廣東號輪船經香港到內地去了。他們回來以後，一切的真相都可明白了。我們都翹首期待着他們的回來。在這中間，我常常和曾仲鳴氏會面，始終沒有斷絕連絡，曾仲鳴也相當的信任我們。

三月十三日上午和曾氏會面了一個多鐘頭，簡直是含笑生花地談着。那時的曾氏實在是隨便大搖大擺地來去着。不過，從我們的眼中看見，好像常常有幾個中央系統的中國人把他們監視似的。我們便忠告他，要他小心點；但他却帶笑地並不接受：『那裏的話，他們祇不過是監視我們的行動而已，絕對沒有危險的。』後來，不幸地中了我們的預料，他被槍殺了。那些犯人大概是在三月五、六日的樣子，由海路再經陸路來河內的，是做得非常周到的伺候時機的中央系統的暗殺份子。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大體上得到如下的結論：蔣氏與汪氏之間，在沉默的諒解下，或者是全然掩蔽着；兩者之間也許沒有什麼連絡的。從這樣的線索可推知蔣氏對於汪氏和平運動的進展，是深刻地注意着，在他自己的期待中，會和從前一樣，採取不即不離的態度。不過，一旦到了走向他所不希望的方向的時候，便不能不用最後強硬的手段，和出以壓迫的態度了。這一次首先狙殺曾仲鳴氏，也許是一種手段也未可知。從蔣氏對汪氏的親信逐漸加以暗殺的行爲，而並沒有直接危害到汪氏本身的事實看來，也

許是恐怕招致蔣氏自己的不利。（內部的動搖，和有力者的非難。）所以對於汪氏的一派，祇有牽制，而他自已却以爲這是一種高明的圓滑的手段也說不定的。不過，危險確是隨時隨刻地接近着汪氏的身上。

雖則在日本與汪氏業已諒解的今日，我們也不能不採取極慎重的態度。

可浪街的住宅，自曾仲鳴氏被刺以後，馬上便到處傳播着，這是汪氏的隱居之所了。在住宅的周圍，不分日夜地有二名法國警官，幾名土人警官，及便衣的中國人數名在警戒着，又花了很多的工夫來修理被破壞的地方，用鐵板做着防禦的工事。從情報網的報告裏曉得，汪氏已經不住在家裏，到了達姆泰阿去了。

從此以後，漸漸接觸到問題的核心來了。連續着有重大的事件。我在這裏借用O君的簡明的日記，便可以正確地看到事實的推移。

四月一日（星期六）關於汪氏的三十一日發表的第三次聲明「舉一個例」，到可浪街訪問汪氏，叩詢他的意見。因爲到這個時候爲止，還不曉得誰是曾仲鳴的繼任者。汪氏一派的聯絡完全斷絕了，也就沒有達到目的，祇是留下一封拜訪的信，便回來了。午後五時得到電話，是流利的法國語：「我是汪先生的一個祕書，你早上的信收到了，希望明天早上會面，時間和地點，明天再打電話告訴你。」我把這個告訴K氏和木村氏。

四月二日（星期日）上午八時來電話。要我帶個黑眼鏡，注意不要帶着另外的人，上午十時到美突羅堂旅館三三四號房間。他自己用Chan Ta Ko的名字說：「這個並不是真名字，這一次汪先生要我繼任曾仲鳴先生的工作，我是法國留學的。」雖則是第一次的印象，已經覺得是可以完全信賴的好人物。

我得到對於汪氏聲明的原文，和昨天的信上的回答。後與K氏，木村氏研討汪氏的聲明。

四月六日（星期四）從日本的翻譯某君手裏，得到大公報暴露「平沼——汪的和平密約。」我與K氏協議，在我們的想像中，我們這樣子擔憂着：是不是汪派中有人和重慶祕密連絡，逐一通報着呢？重慶對汪氏的「舉一個例」採取報復的手段了。這是暴露的戰術，是沒有疑問的。這一個通報者是不是高宗武呢？

在K氏的家裏召集木村及坂本兩氏會談。席上K氏說，最近有二個「客人」來，也許是爲着汪氏脫出安南也未可知的。並嚴肅地相約，要這一件事實現，須由我們四個人全力合作。

四月七日（星期五）午後六時應K氏召，木村氏亦在坐。K氏的說明：「約五時，領事館的直丸書記生來我家，他說：『今早領事館收到中國人送來的一封信。』」他會把這封信拿來的。」從這封信上看，是寫得一手很好的日本文：

「要來的二個人，來了沒有，望賜覆。回信用信封，一同送上，請照上面所書的地址送下。中山，七日。」回信的信封是這樣寫的：

“Mandau Ming Chamber No. 334 Hotel Metropole.”

最近要來的二個人是金田（假名）和石貝（假名）。中山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以前曾有暴露「平沼——汪密約」事件，關於「客人」的事，無論如何是不能洩漏給重慶方面的。這一封信，有沒有問題，也是不可知的；對於這一封信的答覆，在沒有曉得這一封信究竟是那一個人寫的時候，是不放心的。到美突羅去會Chan，沒有會到，又到可浪街去，說Chan出去了。問管門的人：「在汪氏周圍有沒有中山那個人？會寫日本文的是那一個？」答覆是：「沒有中山這個人。會寫日文的祇有汪先生。」把

名片留給Chan，要他趕緊來電話，便回家了。

四月八日(星期六)與Chan沒有連絡。上午十一時，有一「中山」這個人打電話給領事館，用極流利的日本話說：「昨天的信，請答復。」總領事館因為什麼都不曉得，在得不到要領的時候，他說：「那麼，就這樣子吧，話是講到這裏為止。」便把電話掛斷了。這封信和Chan沒有連絡，實在是不可思議的。這樣子，在「客人」沒有來以前，萬全的準備是必要的。協議的結果，有下面的決定：

一、住旅館是危險的，「客人」住在坂本的家裏。

二、客人與汪氏會面的地方，決定深夜在達姆泰阿。

三、汪氏出來，經過杜美羅橋是危險的，決在晚上從達姆泰阿直接到海防。因此，在達姆泰阿與河內之間，晚上九時配置汽車二輛，停在適當的地方。K氏與金田和石貝兩氏的汽車在離河內約五百米突的地方；我自己坐一輛空車，用手電筒的暗號，去和已經約定好了的汪氏夫婦，從達姆泰阿出發的汽車相會；然後，汪氏夫婦轉坐我自己汽車來；汪氏夫婦原來坐的汽車，裝做回可浪街住宅的樣子，回河內去。交代了汪氏夫婦的汽車以後，我們的車子便開走，同時K氏的汽車在後面，約有五百米突的距離，一路警戒着開到海防去。在海防有二、三名坂本心腹的部下警戒着。在啓程以前，用適當的方法，把使用過的汽車司機軟禁起來。

以上的方法，定由K氏，木村，坂本和我自己作預行演習一次。深夜與Chan取得連絡了，要明早會面，因此預行演習便延期了。

四月九日(星期日)午前十時與Chan在美突羅旅館會面。我拿出那個回信用的信封，他說：「這是命令我送去的。」那時候我通知他「爲着答覆汪先生的事」，K氏要和Chan會面。今後關於脫出河

內的事，一切連絡，決定由我轉知汪氏方面的 Chan。

午後 K 和 Chan 會見了，會見的方法，是在河內市外，太湖的散步路上。午後九時，我和 K 氏在太湖散步的時候，Chan 的汽車從後面來了，他坐到我們的汽車來，在太湖邊慢慢地轉了一週。

是雨的一夜，在預定的時間，預定的地點，一切的事情都很順利的進行着。這個時候和 Chan 一同來的，還有一個人，照例是「中山氏」了，一口流利的日本話。我們在太湖的周圍駕駛着，在很少有人經過的堤上。我們停車下來，中山和 K，Chan 和我，分成兩組，在黑暗的堤上追追遙遙地一邊走一邊談着。K 氏對中山講述他的計劃，也聽着對方的意見，約三十分鐘，再乘車到河內，便分別了。

四月十日（星期一）好天氣。K 氏，木村，坂本和我四個駛着汽車，依照原定的計劃，帶了手錶和地圖，實地測驗從達姆泰阿到海防去的路線。

四月十五日（星期六）午後，接到 Chan 來的電話：『來喝茶嗎？』便到美突羅去了，詳要說明「客人」的動靜和今後連絡的方法。利用美突羅會面是十分危險的，要隨時變更會面的場所。我們決定下面的暗號：

看電影去（表示午後八時半乘汽車在太湖的散步路上會面。）

喝茶去（表示電話後，十五分鐘內在美突羅三三四號房間會面。）

散步去（表示電話後十五分鐘內在植物園散的步路上會面。）

K 氏爲着迎接「客人」與坂本到海防去了。

四月十六日（星期日）金田，石貝兩氏於午後四時到海防港內。

四月十七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時半，在 K 氏和坂本氏的引導下，金田和石貝進入山根氏的私